



蒙难的中国

国民党战区纪行

(英) 弗雷特·厄特利 著

唐亮 钟旭辉 译
徐双喜 许静静

解放军出版社

蒙 难 的 中 国

——国民党战区纪行

〔英〕弗雷特·厄特利 著

唐 亮 钟旭辉 译
徐双喜 许静静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11610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1111610

Freda Utley
CHINA AT WAR
Faber Limited
London 1939

根据伦敦费伯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三九年版译出

蒙难的中国

——国民党战区纪行

【英】弗雷特·厄特利著

唐亮 钟旭辉 译
徐双喜 许静静

•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0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 10185·161 定价: 1.90元



本书作者在中国采访途中（一九三八年）

出版说明

DC17/07

为满足党史、军史研究以及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出版《中国革命纪实译丛》。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国外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作家、记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斗争情况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甚全面等原因，一些书中反映的内容难免有误或带有片面性，有些观点还可能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为了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基本按原文付印，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者

内 容 提 要

作者自述于一九三八年在中国采访的经历，其中有会见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与周恩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会谈，在前线及后方的见闻等。作者试图全面揭示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并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复杂历史，特别是重点披露了正面战场前线的情况，其真实客观程度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此类书中不多见。书中还介绍了西方大国和驻华记者的对华态度。

目 录

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香港和广州·····	(1)
第二章	武汉三镇·····	(30)
第三章	从汉口到前线的第一次访问·····	(82)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地医疗服务·····	(116)
第五章	重访扬子前线·····	(149)
第六章	沦陷前的汉口·····	(180)
第七章	中国的政治局势·····	(223)
第八章	中国会灭亡吗？·····	(248)
第九章	日本的战争目的·····	(266)

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香港和广州

1 香 港

七月初的一个早晨，香港到了。在三个星期的旅途中，轮船穿过地中海，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我懒懒散散地晒晒太阳，消磨时光。离开英国时，我就怕汉口在我抵达之前陷于敌手。这种紧迫感，还使我不敢在香港这个可爱的城市逗留过久，好好研究一下所谓的“香港心理”。当然，短暂的停留仍然使我相信：香港的英国人比之上海的英国人，更多地带有传统的“上海心理”。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但是，在香港的许多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十年前的中国，害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甚于害怕日本人的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香港富有的华裔英国人曾慷慨大方地为英国参战捐款，然而，对今天自己同胞的呼吁，却并不怎么在意。

一九三八年，香港称得上是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自从一九三七年秋上海被日本人侵占以来，香港成了外国同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这种贸易活动不同于外国人在中国与日本人所进行的。此外，香港还吸收了中国的全部流动资本。诚然，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也是英国的一

个直辖殖民地。正是这特殊的地位，使得香港既处于战争之中，又不在战争之中。不象中国的其它城市，它既没有遭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也没有被日本人的机枪扫射，而且大大得益于战争。显而易见的是，香港的兴盛有赖于它和广东及中国的内地相毗邻。一旦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切断与大陆的联系，它就注定要成为东方的维也纳，一个失去了营养的生物。可香港却不象上海，日军在上海的驻扎、日本人的傲慢与无礼时时刻刻都在提醒那里的外国人；如果日本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所有在中国的“白种人”都将会面临何种遭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香港依然没有加入到战火中去，英国人依旧过着他们在东方习惯了的安逸愉快的生活，富有的华人充斥酒馆和饭店，洋洋得意地过着奢侈的生活，真是毫无耻辱之感。不仅如此，香港人甚至连建立难民营也老大不愿，他们不想安顿逃自广州的贫民。相比之下，中国在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的华人中集资筹款却很容易。

香港的许多避难者既不象那些受饥饿折磨、衣着褴褛、命运悲惨的难民，成千上万地沿着内地的公路长途跋涉，或充斥于未沦陷的城市街头，又不同于无依无靠、夜宿上海街头的男女老幼，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慢慢地死去。香港的难民多半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有事可做。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举家逃自广州，为的是躲避日机接连不断的轰炸；有的带着资本从各地来到香港，为的是在战争中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仍然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广州或汉口的官员也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到这里，以求得生命安全。当时，除了爱国分子，有钱的广州人都逃到了香港，或至少也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这里。其实，中国是一个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按理说，把如此众多的中国法币兑换成外币带到香港是不可能

的。然而，中国官员中的腐化习气，外国租界的存在，外国银行在中国所处的地位，都增加了严格控制外汇的困难。事实上，没有外国银行的通力合作，就无法对中国的资本实行真正的控制。香港由于属于英国管辖而没有战火，的确对中国有利。可与此同时，它又象上海的国际租界一样，使富裕的华人得以逃避税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那时的香港，物价飞涨，生意兴隆，旅馆暴满，房价倍增，酒吧、饭馆和商店里处处是人。正当中国的其它城市惨遭战争蹂躏之时，香港却突然发迹起来。

不过，繁华来之不易。一旦日本人进攻广州，香港的财源就将被切断。人们或许会问，日本人有没有可能进攻香港？那时英国会不会出兵保卫？但无论日本采取何种行动，事态的发展已经显而易见地证明，香港的走运仅仅是一时而已。

一九三八年夏天，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当推九龙。它是中国大陆上面对香港的一块“租界地”，也是广州——汉口五百五十公里铁路线的起点。我乘坐的德国轮船就停靠在这里。它以最快的速度卸下中国的军需品，然后将开到神户，卸下日本的军用物资。紧挨德国轮船的是一艘意大利货船，它正在卸中国的其它军用物资。九龙码头还停泊着英、法、俄、美等国的轮船。当时，中国正尽其所能向各国购买军火，然后通过铁路线（虽然日本人每天都对它进行轰炸，可从未成功地将其摧毁）运至长沙和汉口。为了购买军火，中国动用了全部外汇和战前寄存国外的白银，还尽可能多地出口茶叶、桐油、锰、锑、钨及其它商品，作为新的支付手段。中国知道，总有一天日本人会进攻广州，或占领汉口。于是，她赶紧储备武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当一九三八年十月

广州和汉口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已拥有的军用物资足够其应付九个月的战争。

军用物资的装运几乎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而且又由英国管理，因此即使当事人想对此保密也不太可能。人们可以在宽阔的码头随意地散步，可以看到汗流满面的苦力们扛着沉重的箱子或精疲力竭地躺在岸边，可以记下货船来自何处。我在香港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一艘商船的大副，船主是在香港的法国修女，船头飘扬的却是英国国旗。船长是美国人，而工程师和二副都是日本人，商船运载的军用物资则来自苏俄的敖德萨。这就是航海贸易和军火贸易中所谓的“国际主义”。据说，唯一不向中日双方出售武器的是捷克斯科达的一家兵工厂。这种状况使人们很难存有为民主而战的幻想，相反倒使他们想起了业已消失的战后文学：正当人们以理想或意识形态为名进行交战的时候，它告诫人们，要警惕全球武装倡导者的阴谋以及各种战争谎言，指出这一切只会加剧战争。一位法国传教士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道：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从中日双方获取了所希望的一切的时候，战争才会结束。

在香港的外国船主很少想到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也很少承认“年轻中国”或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存在。但传播丑闻的人却不少，他们大肆嘲笑中国官员的腐败。所有人只看到旧中国的个人主义和封建裙带关系，而没有看到新中国正在战争中壮大。今天的中国就象一头正在换毛的动物，虽然旧毛依然遮盖全身，但只要走近细瞧，便可看到旧毛底下正在生成着新毛。

此外，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只要处在战时，所有国家就都会有投机商存在。即使英国也

有，只是腐化的方式更隐蔽更温和而已。经常读日本报纸的人就可知道，日本也充满了腐败的现象。同时，日本的历史表明：明治时期是日本的一个伟大时代，它从该时期起开始向现代化国家发展。可是，当时高级官员和将军的腐败却比任何时期都表现得更为明显。

问题在于，西方人在香港所能见到的只是战时中国的阴暗面。在这里可以看到非爱国的富人成群，武器买卖双方云集，却无法看到为民族存亡而战的中国人，也无法体会出年轻中国的精神风貌。西方人倘若对年轻中国有印象的话，也就是对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回忆。那时，在反帝爱国浪潮面前，西方人虽无性命之忧，但其在华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三个半月以后，我来到了上海。这里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与在香港的英国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英国人可以看到中国新的风貌。那里的英国官员对独立营和中国士兵的勇气大加赞扬——他们在装备落后、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抗敌近四个月之久。上海也很少有人幻想，一旦日本人在战争中获胜，它还会允许英国或美国扩大在中国的贸易。

我在香港会见了不少名人，其中包括：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她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宋氏姊妹的兄弟宋子文，他是中国最诚实最能干的银行家兼官员，刚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活，从巴黎返回的陈友仁，眼下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保持着距离，并在香港和上海的报纸上批评后者的政策，不过，他期望或至少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的政坛。

陈友仁曾引起英国人的害怕和仇恨。那时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负责与英国进行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谈判，这也就是有名的“陈友仁——马利协定”。现在，陈

友仁住在九龙的一所小房子里，英国人瞧不起他，自己的同胞也不信任他。在英国人的眼里，陈友仁代表了革命的国民党时期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他的名字使他们想起了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侮辱了英国人，损害了他们的帝国主义利益。在蒋总司令看来，陈友仁是宗派的头面人物，从未屈从于他，也向来未停止对他的公开抨击。而共产党人则认为，虽然陈友仁赞成他们联苏、与西方帝国主义妥协以及动员民众的政策，但同时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分子，因此也对他轻视而不加理睬。当然，英国人的态度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往事进行神经质的联想，而蒋介石是出于对“宋王朝”反对者的敌意。无论因为何种缘故，对英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来说，陈友仁这个名字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他意味着中国在反英旗帜下从事的独立斗争，并提醒他们，他极有可能被政府召回重用。目前已谣言四起，说他将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无疑，陈友仁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他言辞尖刻的文章，直截了当的批评，诚然苦口的话，也不失为一副健身中国的良药。可是，国民党政府却习惯于大唱保全面子的颂歌，并自我陶醉于眼下正在进行的战争。

或许有人把陈友仁当作国民党内的托洛茨基；他一直不断地提醒国民党牢记其成立时的宗旨；还大胆地告诉蒋介石，他并非超人，不应事事都要自己去处理，也不应将权力统揽在自己的家属或私交手中。陈友仁不仅出生于国外，而且又在外国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因此也就很自然地用西方人的眼光看问题。而蒋介石却对除日本以外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就是说话都带有浓重的乡音，所以便习惯于用中国人的方式处理关于统一中国和抗击日本这一重大问题。可见，很难协调他们两人的种种不同主张。

在我与中国人进行的所有谈话中，要数陈友仁的措辞最为激烈。他的洞察力极敏锐，或许他存有个人的野心，却仍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西方世界和其奉行的政策，陈友仁有着极好的理解，这在中国实属罕见。他和孙逸仙夫人一样，主张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亲密的合作；与此同时，却不对其存有丝毫的幻想。今天的中英两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主张同英国联合。陈友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他，也许就是因为此种缘故。对他极为不利的是，他是在西印度长大的，不仅很不习惯说中国话，而且就中国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说，他也完全是一个“老外”。因此，他很难理解自己的同胞。蒋介石则恰恰相反，他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拘泥于中国人的办事方式，对中国以外的现实世界所知甚少。

在九龙郊区陈友仁的寓所，我与主人进行了两次长谈。他再三强调，兵工厂的缺乏是中国目前在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因素。

“中国，”陈友仁说道，“光靠自己孤军奋战难以取胜。她必须争取盟友，必须象建立军事战线那样建立一条外交战线。可是，蒋介石把胜负仅仅看作是一个军事问题。日本正在从事的是极权主义战争，我们的抵抗也必须以极权主义的方式进行。蒋介石理应认识到外交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外交战线并不存在。”

“一九三二年，日本尚没有现代化的空军。从那时起，我们具备了创建一支空军的条件。可是，虽然筹款数百万用以购置飞机，但当战争爆发时，我们仍只有一百五十八架或一百六十七架飞机。他们让蒋夫人负责空军的领导工作，而

她动机虽然很好，但仅仅是主观愿望而已。由于她不具备关于空军方面的识知，所以俄国人在她负责时拒绝送飞机给中国。”

“后来，又产生了一个德国顾问问题。起初，德国人有一种理论，认为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消灭封建割据，把中国变成德国资本和商品的广阔市场。因此，一批顾问奉命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以后，蒋介石的‘使命’又成了德国反苏的工具。里宾特洛夫认为，通过把中日双方拉入共同的反苏集团，就有可能协调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利益。由此，德国向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包括武器和军事顾问。但是，里宾特洛夫没有认识到，他的此一政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当中日战争继续升级，该矛盾便暴露无遗。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希特勒的演说之后，德国撤走了自己在中国的顾问。希特勒知道，要么失去德国资本和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要么失去日本这个军事盟国，两者必居其一。最后选择的结果是德国使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利益。”

“在关于中国建立防御区和空军的问题上，德国顾问犯了错误。他们根据兴登堡防御线理论，认为防御线不可分割。但该理论并不适用于领土广阔的中国。虽然这些顾问都是军士级教练员，可他们的思想和战术却不宜在中国运用。”

数月之后，就在我离开汉口的那个晚上，与陈友仁的这个谈话再次在我耳边回响。该天晚上，我与斯坦尼斯上校在飞机场散步。他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和亲信顾问，又是德国左翼社会民主党党员、施莱歇尔将军的朋友。斯坦尼斯上校和妻子双双逃离纳粹集中营，目前在中国过着流亡的生活。他英俊潇洒，性格鲜明动人，机智勇敢，又喜欢冒险。他憎恨希特勒，对蒋介石却非常忠诚，而且充满了一片赞美之情。

在斯坦尼斯上校看来，德国顾问简直是蒋介石的无价之宝。

“法国人傲慢无礼又缺乏耐心，无法用作中国的军事顾问。他们只是一味地告诉中国的指挥官，应该做些什么，然后一耸肩了之，实际上却什么用也没有。而英国人则太懒。唯有德国人才具备军事顾问应有的耐心，冯·福尔肯豪森正是用策略和耐心使他的主张得以采纳。他永远也不会说：‘我认为这些是你们应该做的。’他只是说：‘我以为，最好的策略是你一两个星期以前提出的方案。’然后再概述他自己的计划。”

“那么，俄国人又是如何？”我问道。

“不错。不过，他们的心理同中国人的心理实在太相象了。俄国人的‘实在没法’与中国人的‘无能为力’同出一辙。此外，他们的军事顾问过分偏重专业化。每个顾问只知其一，不知其它。举例来说，他们的技术顾问光知道某一特定武器的性能构造。这在中国就显得作用甚小，因为中国的武器来自世界各地。”

接下去，斯坦尼斯讲述了他自己又是如何敬佩蒋介石：

“蒋介石晓得，若要成功地抵挡日本人的进攻，必须耐心等待几年。为此，他再三向日本人让步，直到有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止。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压力下，蒋总司令被迫与日军开战。”

或许在陈友仁看来，斯坦尼斯上校仅仅从部队的装备和训练来看待战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对士气的作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只要给我五名真正知道为何而战的士兵，”他说，“我就能率领他们抗击成百名的敌人。”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飞机场散步的那个晚上，斯坦尼斯上校还谈到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伤员没有得到适当治疗和照顾的问题（见本

书第六章)，说它已受到高度重视。他说，还在好几年前，冯·福尔肯豪森就敦促中国，建立一个组织合理且有良好训练的战地医疗服务机构。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与陈友仁的谈话上来。我问他，据说由于姊妹们的嫉妒，她们想让孔祥熙博士留任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未能为国发挥其巨大的才能。此话是否当真？陈友仁做了以下答复：

“宋子文是反革命的谋士之一。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活动达到顶峰，结果就是南京政府的成立。南京政府耗资三十亿美元兴建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受益的却是日本人，即他们得以加快进攻中国的速度。极为荒谬的是，既然修建铁路和公路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那么该项建设的任何进展就只能使今天的日本人获利。宋子文代表了反革命集团中银行买办那一翼，他们只是从财政上考虑发展交通问题。宋子文本人又是一个极精明的政治家，在洪水行将泛滥之时，他首先关切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声望——这在外国人中间是极好的。日本人摧毁了银行家和买办设在上海的总部，宋子文就设法在香港重建。如今，他在那里保持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财政控制。实际上，正是他宋子文操纵着财政界的局势。他可以在政府中担任他所希望的任何职务。可是，由于他对战争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因此除非得到英国的贷款保证，他绝不承担职责。宋子文假装和孔祥熙存在不和，却又是他自己把后者拉来充任财政部部长，从而成为对他有益的替罪羊。他和在汉口的姊妹及蒋总司令一样，把中国看成是他们宋家王朝的私有财产。”

接下去，陈友仁谈到了中国的“统一战线”问题。他说他自己支持统一战线。这不仅只是因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